

【故地往事】

薛河上的隋代石桥

□杨建东

说起隋代石桥，许多人会想到河北的赵州桥，那是隋代大业年间建造的大型石拱桥。有人有水的地方要建桥，历经千百年的洪水冲击、硝烟烽火，石桥被历史的风雨侵蚀而湮灭了。谁也不说清千百年前河上有什么桥，在哪个河段上有什么桥，唯一能详细说明某个朝代某个河段某个人捐资建桥的，只有石碑。

枣庄市山亭区的米山、柴山有泉水流下来，两股泉水在西江交汇向西流成大河，古称薛水，亦称薛河，向西流经山亭、滕州、微山和江苏沛县，在沛县金沟村入泗水，全长150公里。滕州官桥镇薛河北岸北辛村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是7300年前的人类生活遗址，被命名为“北辛文化”。也就是说，在73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依河而居。

1997年10月，微山县水利局进行薛河微山段清淤工程，我作为考古工作者在河底发现了树木化石和更新世(地质第四纪的第一个世)的猛犸牙化石，证明薛河的河龄在这个范围内，由滕州市古薛文化研究会向社会宣传薛河的万年河龄。

1995年，微山县夏镇小官口村的村民在干涸的薛河挖沙时挖到一块隋代大业二年石碑，村民将其交文物部门。碑高1.5米、宽0.46米，碑的上半部刻龕窝，在龕窝内刻三尊高浮雕佛像，主佛坐在须弥座上，斜披袈裟，左右二菩萨穿长裙，赤足立于莲蓬上。主佛座下有一夜叉双手托举主佛，夜叉两旁各有护法狮。碑下部刻文字，楷书，大意为彭城郡留县查屯乡佛教徒朱贵，原籍沛国，居住岸边，是汉代御史大夫朱博的后裔，身强力壮，威风凛凛，能文能画，会开药方，其妻陈氏是汉代大傅陈蕃之后，性善心宽，四德兼备。大业元年河水陡涨，乡民来往不便，又无财力修桥，朱贵夫妇便发起建桥的提议。

碑文对朱贵夫妇极力赞誉，称他们是历史名臣的后裔。古代追溯先祖、攀龙附凤、沾光沾喜的社会习俗，一直沿袭至今，修家谱、建宗祠时总要找一位同姓的历史名臣、忠孝将帅作为自己的先祖，以示荣耀。

从碑文上看，隋代薛河两岸的村庄很稠密，河两岸土地辽阔，佛事兴盛。隋代大业元年秋季，山洪猛泄，河水陡涨，冲垮小桥，乡民来往受阻，望河兴叹。朱贵夫妇与朱解脱、郑决疑商议，修桥铺路、积德行善是人间善举，我们更应该率先行动。于是朱贵等十人筹划

捐资，纠集工匠，购来石料，在冬季施工建桥。这座桥的规模不大，从南北两岸向二滩修筑土路，而后在河底砌筑几十个石墩，在石墩上铺设石板，一座简易石桥就建成了。

河宽120米，石桥两端是土路，从桥堍算起，石桥长六七十米。石桥竣工后，为永远记住朱贵等人的恩德善行，乡民筹资请石工镌刻一块造像碑立于桥头以纪念建桥人造福乡民的无量功德。桥是隋代大业元年冬季建成，乡民于翌年正月立碑，立功德碑要举行仪式，请来朱贵等十位捐资人光临现场，祈祷水势平稳，永无水患。这座石桥从建成之后应有几次维修，现知确切的一次维修时间是唐代会昌五年，距建桥已有240年。

1997年10月，微山县水利局进行薛河微山段清淤工程施工时，挖出许多唐代佛寺用品，当时我做考古工作，在河工地监守40余天。11月中旬，几部推土机在河心推出许多石碑、石佛像、石须弥座及长条石、方石。四块唐代石碑分别是开元五年、六年、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刻制的，碑文记载开元年间薛河南岸有一座伽蓝寺，众僧住持，佛事兴盛，香火旺盛，附近清信士为纪念死去的父母及先祖，花钱刻制小石塔、小佛像、石碑放在寺内，定期追荐。

唐代佛教势力颇大，大寺院占有广大良田，佛教的势力对朝廷州县造成威胁，宰相李德裕建议灭佛拆寺，于是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四月下诏灭佛，僧尼还俗，拆掉寺院，只保留了几座大型寺院。薛河岸上的伽蓝寺就是“会昌灭佛”中被拆除的，民工砸断石佛，砸毁须弥座，有人说石碑别砸，运到河中维修石桥，便将石碑、长条台阶石、殿堂的方形基础石运到寺后的河里维修加固石桥。

不知经历几百载，历经几多硝烟烽火、历经多少次“千里无鸡鸣”的灾害惨象，没人在桥上走动，没了人气也没了维修，石桥在某次洪水冲击中坍塌了，只有一堆荒石被埋在河沙下，再也没人知道古河道上的古石桥，甚至撰写州志、县志的文人在桥梁卷上也不记载隋代石桥。直到隋代造桥碑出土，考古工作者才知道这儿曾有一座石桥，曾有隋唐时期的人文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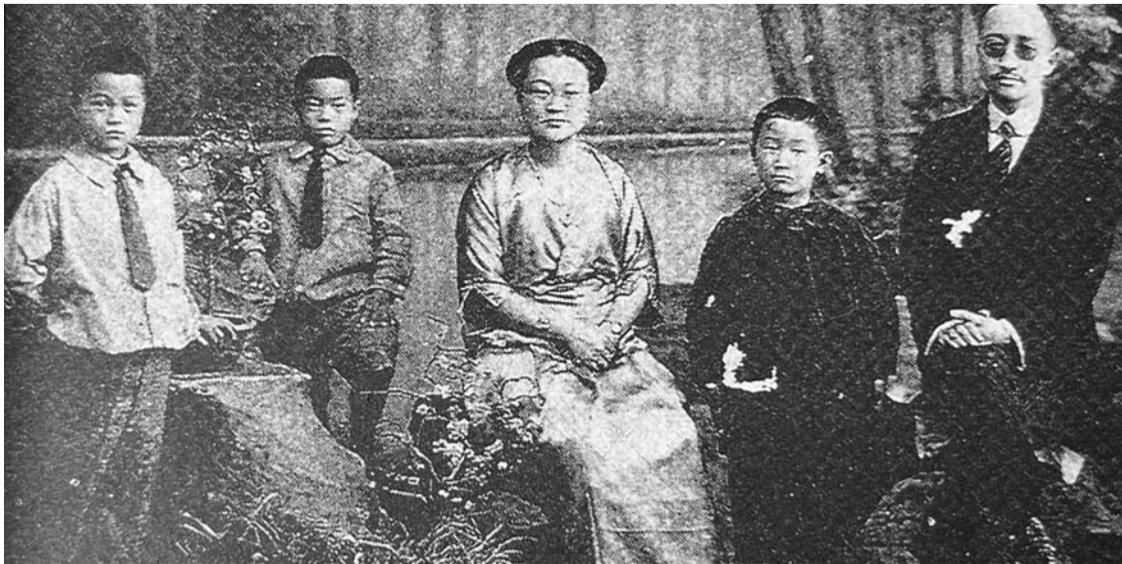
今天，薛河仍在，隋代石桥的建筑构件仍堆积在河的二滩上，朱贵的名字闪烁在文史资料中。由于隋代兴亡37年，隋代遗留的文物皆为珍贵文物，因此这块隋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com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1916年，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及其三子章用、章可、章因在东京的合影。

【史海钩沉】

章用执教山大数学系的短暂经历

□许志杰

1937年初，章用乘船离开留学近十年的欧洲回国，不久坐火车转道济南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数学系，开始一段新的也是短暂的教学生涯。

山大数学系创办于1930年，是当时最早设立此系的国立大学之一，系主任由著名数学家黄际遇担任，会集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数学才俊，教学科研实力不凡，章用的加入无疑为山大数学系增添了力量。

章用是何许人也，知道他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在他工作过的山东大学，也难以查到些许相关资料。但是说到他的家庭可能就无所不知了，他的父亲是政治活动家章士钊，母亲则是安徽名门之后吴弱男，曾在辛亥革命前担任孙中山的英文书记员。章用与著名外交家章含之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章含之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养女，所以两人以兄妹相称。

章用的父亲章士钊一生留下很深的时代烙印。章士钊一生共娶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吴若男，第二位夫人奚贞，原名奚翠贞，她领养一女原名叫郭秀兰，后来随继父章士钊姓，改名章含之。第三位夫人殷德贞，也是领养一女名叫章眉。吴若男出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六岁，她的祖父吴长庆曾任浙江提督，父亲吴彦复乃祖父次子，曾与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因倡言革命，时人称之为“四公子”。

章士钊夫妇都是接受过西洋学校教育的，但对于三个儿子的教育还是以传统的家庭式为主。吴弱男对孩子的管教甚严，三个儿子几乎整天在读书，吃饭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是为什么呢？吴弱男说怕孩子们浪费时间，章士钊也说：“愚家晚食，例不具餐，妻得面条一盂，几面包数片而已。”又说：“寒门三子，自识字以至成童，皆夫人一手董理之。”吴弱男给孩子们立下的规矩非常严格，致使他们的身体机能受到破坏。大儿子章可曾说，他们兄弟都习惯了母亲的管教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兄弟的身体状况极差，有时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才大便一次。结果三个儿子皆有学识，却受身体拖累，无大作为。

1928年夏天，章士钊、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赴英国，最后定居德国哥廷根。章士钊只在此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以经济困难为由回国了，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继续留在欧洲。此间，季羨林也在德国留学，于1935年亦入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季羨林有多次记载：“章士钊下台后，夫妇俩带着三个儿子，到欧洲去留学，就定居在哥廷根。后来章士钊先回国，大儿子章可转赴意大利去就学，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去读书。只有二儿子章用在哥廷根，陪伴母亲。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章用，季羨林说，“我从柏林来到哥廷根，第二天随着一位中国同学去访俊之(章用的字)。他同母亲赁居一座小楼房的上层，四周全是花园。这次他母亲说话最多，俊之并没有说多少。在谈话中间静默的一刹那，我只注意到，他的目从眼镜边上流露出来，神秘地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就这样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颇平常的，但不知为什么，以后竟常常往来起来。他母亲人非常慈和，很能谈话。每次会面，都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人在独自。他虽然念的是数学，但因为家学渊源，对中国旧文学很有根底，作旧诗更是经过名师的指导，对哲学似乎比对数学的兴趣还要大。我自己虽然一无所成，但因为平时喜欢浏览，所以看了些旧体诗词。于是

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交谈、讨论日渐频繁。”

季羨林说，“后来，等到我们再聚到一起时，章伯母就笑着告诉我，自从我到了哥廷根，他儿子仿佛变了一个人，以前同他母亲不太多说话，现在居然有时候也显得有点活泼了。他在哥城八年，除了间或到范禹家去以外，很少到另外一位同学家里去。多少年来他就是一个人到大学去，到图书馆去，到山上去散步，不大同别人在一起。这情形我都能想象到，因为无论谁只要同俊之见上一面，就会知道，他是孤高一流的人物。”但是，章用唯与季羨林谈得来，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甚至季羨林是章用唯一的朋友。久而熟络，章用在季羨林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很多才华，他给季羨林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季羨林的敬佩之心：

空谷足音一识君，相期诗伯苦相薰。体裁新旧同尝试，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气嘘史笔发清芬。千金敝帚孰轻重，后世凭猜定小文。

季羨林谦虚地说：“我看了脸上直发热，对旧诗，我虽然喜欢胡谈乱道，但说到做，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我哪里敢做梦做什么‘诗伯’呢？但他的这番意思我却只有心领了。”虽然季羨林是谦虚了些，但也不得不佩服章用对于季羨林的观察与评价，还是很有眼力的，日后季羨林真的是成了学术界顶梁柱级别的人物。遗憾的是，“孤高一流”的章用，未能看见季羨林的成就便早逝。

章用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教书，这个选择是不是受到季羨林的影响或是介绍，不得而知，因为季羨林曾于1926年就学于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对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印象颇佳。如季羨林所说，虽然章用主修数学，因受父母深厚的国学底蕴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研究颇多，可谓底子厚重。

上世纪30年代的山大文史拥有一批学科领袖级人物，章用应该略有耳闻，也有可能是本着山东大学这个文史研究出众的特点而来。但是，当时日本人已经觊觎整个中国，地处青岛的山东大学不得不开始谋划搬迁内地，整个学校动荡不安，无法静心教学。而章用的身体每况愈下，实在无法坚持正常教学。因此，半年多之后章用便离开山大，转投时局相对稳定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以便一边教学一边养病。然而，时隔不久，日军攻占东南沿海，浙江大学西迁江西，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章用无法坚持，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章用转道香港治病。惜为时已晚，29岁的章用于1940年在香港病逝，未婚。

季羨林说：“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先生’。在他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我一个回忆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

章用在山大数学系执教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却将自己短暂的人生经历与山东大学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他的父亲章士钊与山东大学的很多教授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书法家蒋维崧，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以及广西桂林来往颇多，章士钊所用多枚印章均由蒋维崧篆刻。同时，章士钊还与山大中文系教授黄公渚、萧涤非相熟，当为“文友”。

不幸的是，章士钊与第一任妻子吴弱男的三个儿子，次子章用、三子章因都是英年早逝，长子章可虽然于1986年去世，享年76岁，却因为身体原因一生无子。据说章士钊晚年有所悔悟，常举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例，劝别人教育孩子时，更多要注意身体锻炼，而不能一味追求学习功课，当发自内心深处。